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6.05.003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文明情感底蕴的赓续发展

朱楷文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进程中,汉语“文明”语义遭遇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叙事逻辑与解释框架的挑战。不同于以理驭情、情理二元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有着“情深而文明”的独特情感底蕴,走出了一条以情为端、情理合一的文明之路。情是文明生成的本体源头,自然情感经由情感理性化——“礼”的涵育,升华为道德情感,在“理一分殊”的层层拓展中,由“爱亲”的“亲亲”,发展为“泛爱众”的“仁民”,最终达到万物一体的“爱物”,文明由此不断发展。中华“情深”文明的内在逻辑,在传统社会中外显为以“礼”培塑内生情感秩序、培育和谐情感关系、涵养克己情感修养的传统文化景观。经由“第二个结合”,大同理想昭示的“天下为公”、礼治秩序维系的“以和为贵”、古典政治倡导的“民为邦本”、先民自发感悟的“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情感文化在当代得以重新激活,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升华为以发展生产力为旨归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的“两个和解”、民心政治遵循的“人民至上”、民众自觉认同的“生命共同体”等新文化生命体,由此推动中华“情深”文明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创造赓续情感文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化解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对立与隔阂疏离、超越文明冲突论与文明等级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理性;情感

一、引　言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见于《易经·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先秦经典中的“文明”多指德慧兼备的帝王、圣人、君子,其行止所至之处便能以文化人,产生经纬天地、照临四方之效[1]。在明清两代,“文明”一词的使用场景更加广泛,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新增了表征社会总体进入一种与野蛮、草昧等相对的进步状态的义项,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求辟草昧而致文明。”[2]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以前,汉语“文明”概念在本土语境中不断发展,虽与现代意义尚有差距,但已蕴含通向现代文明的因子。然而,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汉语“文明”的原有语义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从日本传入的和制汉语“文明”,即日本借用汉字“文明”对译西方的“civilization”[3]。也就是说,汉语“文明”原生的所指被西义代替,留下了一个能指外壳,文明话语权由此逐步被西方掌控[4]。

诚然,文明具有公认的共性内核,但亦因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而呈现出个性特质。

引用本文:朱楷文.“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文明情感底蕴的赓续发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5):21-2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ZHC03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ZXZB009);江苏省教育规划专项课题项目(C/2026/01/14)

作者简介:朱楷文(1991—),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情感思想政治教育与情感社会学研究。E-mail:zhukaiwen@njupt.edu.cn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5]224“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5]224 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情感底蕴。在汉语原生语义中,“文明”是指内蕴深厚人情涵养、外显彰明文德气象的人文生发过程。《礼记·乐记》中“情深而文明”一语,道出了“情深”对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情乃是文明生成的本体源头,自然情感唯有经由礼涵育,升华为道德情感,从“自爱”发展为“他爱”,最终达至囊括天地的“它爱”。由此观之,中华文明在本质上呈现为情理合一、以文化人、贯通天人的文明形态,相较于西方理性文明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经由“第二个结合”,中华文明独特的情感底蕴实现赓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6]289 基于此,本研究以“第二个结合”为视域,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文明独特的情感底蕴及其内含的理论逻辑、呈现的文化景观,探究中华文明情感底蕴实现赓续发展的“密码”,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根基。

二、中华文明情感底蕴的挖掘和阐发

情感作为一种关键要素,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明不仅生成了“情深而文明”这一独特的文明发生逻辑,而且孕育出以礼“治人之情”这一标识性的传统文化景观。

1. 中华文明独特的情感底蕴——“情深而文明”

中西方文明在情理关系上存在文化分野,“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西方是重理的,中国是重情的。”[7]16 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情感往往被想象成意料之外和不可控制的、危险和脆弱的、肉体的和主观的[8]。野蛮、未开化、蒙昧等是一类与情感主导相对应的状态,文明的演进就是人类理性程度不断提高、将情感作为“剩余物”不断排除的过程。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把灵魂比作一辆马车,理智是灵魂的驭手,激情和欲望是拉车的两匹马。”[9] 其中,少数最理智的“哲学王”应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在中世纪时期,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理性精神用于解说基督教教义,以理性论证信仰,使理性为信仰服务,具有理性色彩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10]后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明诞生的重要因素。近代时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在不断推动理性主义文化,把理性视为进步的核心动力,文明的目标是“人类理智和知识的进步”[11]。黑格尔把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顶峰,他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12]。纵观整个西方文化历史,尽管不乏反对把“以理驭情”视为文明的声音,如休谟喊出了“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13]这种相对立的口号,但“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是不争的事实[14]。

不同于西方将理性视作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核心质料,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的理解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儒家关于“情”与“文明”关系的诸多论述中,最经典的莫过于《礼记·乐记》中“情深而文明”一语。对此,孔颖达疏曰:“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情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方悫注曰:“情深,然后其文明。”陈澔注曰:“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孙希旦注曰:“情深者,谓喜怒哀乐之中节……文明者,文采著明。”有学者指出:“情感是人类文明结构中潜移默化、深藏若虚的因素”“中国古典思想视野中的‘文明’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这种色彩的底色就源自‘情感’”[15]。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情’是指情感,‘深’一方面意味着情感发自人内心的深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另一方面意味着自然情感的超越,即道德情感的产生。进而,‘情深’可理解为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和谐统一,文明由此而得以生发。”[16] 目前,对“情深而文明”的解读已形成以下共识:第一,情是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关键要素;第二,“情深”内含道德意蕴;第三,“情深”与“文明”二者为因果关系。

2. “情深而文明”内含的理论逻辑

深挖中华文明这一独特的情感底蕴,需要进一步明晰“情深而文明”的内在逻辑。

第一,为何“情”先于“理”。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情是“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17],是“立国与社会建设的基础”[18]。“情”对于“理”具有先在性,是文明的前置要素。在本体论层面,《郭店楚简·语丛二》中的“情生于性,礼生于情”清晰地勾勒出“性—情—礼(理)”的生成次序;《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则进一步表明,作为伦理准则的“理”与作为外在仪轨的“礼”都是以情为本体源头的派生形态。在人性论层面,情是本然人性的先天禀赋。《礼记·礼运》有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说明人情与生俱来、客观普遍,是人本性中天然共通的生命内容,人唯有持守本真情感才能实现本真存在,否则便会沦为虚伪的佞人,丧失人性本然面目。在认识论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并非西方以逻辑认知事物本质的“物理”,而是情感理性化的“情理”[7]77。换言之,“理”是从内心原始自然情感中提炼升华而来,依托现实情感获得实质内涵并外化为礼的规范仪文,认识“理”的路径是向内的情感体认而非向外的逻辑求证,“通情达理”正是这一内涵的凝练表达。“情”对“理”的先在性,根植于农耕社会的现实结构。农耕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同财共祖,血缘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皆不同程度沾亲带故,构成了超级熟人社会。在这种“强关系”格局中,不能讲西方逻辑意义上的“理”,也无法按市场定价的“计算”逻辑来交往,关系的再生产只能依循情感伦理的路径展开[19]。“礼”的出场,正是为农耕共同体中自发的情感秩序确立稳定的行为范式。

第二,为何“情”要“深”。源于人本性的自然情感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有在情欲满足的层面,才衍生出善恶判断。人在“感于物而动”中会被欲望捕获,“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礼记·乐记》)。儒家虽然肯定“情欲”产生和满足的必然性,但若不合理地满足情欲,便会侵害他人,这并非文明状态。农耕社会物质产出有限,纵欲则财物不继而争夺生,共同体便无以维系。因而要“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荀子·性恶》),使人人各安其分、相让不争,维系群体的良好秩序。不同于西方对情感加以控制或者排除的驾驭逻辑,儒家强调以理(礼)育情,即通过礼教让人们反思并化解自身的私欲、恶情,遵守礼仪道德规范,升华情感维度和层次,达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境界。人的自然情感经由内在之“理”和外在之“礼”的涵养不断向更高境界升华,趋近“仁”之本质规定性的过程即为“情深”,而“‘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是情感的理性形式或理性化的情感。”[7]107由此可见,“理”源于“情”,规导“情”,最终回归于“情”——也就是“仁”。

第三,为何“情深”而“文明”。儒家围绕“仁”,原创性建构出本土化的文明图式。其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是这一文明图式的集中表达[20]。首先,“亲亲”是文明生成的根基。仁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内在于天伦亲情中的本真情感,无此,仁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是仁的本源,人只有先在亲缘关系中懂得爱,才能将爱推恩及他者和万物。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孝悌之情由此成为维系小农生产最实在的纽带。其次,“仁民”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人必然要以道德主体身份进行公域交往。“亲亲而仁民”便是要求将血缘亲情之爱推扩至全社会,实现从“爱亲”到“泛爱众”的转变。公领域的泛爱众要遵循“忠恕”原则:尽心之谓忠,推己之谓恕[21]。“忠”要求人将自己作为道德主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要求人对他者同情共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若人们普遍不关注超出他自己或者家庭满足和享受的任何人,那么文明还是停留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阶段。在传统社会,一家一户力量有限,修水利、办婚丧、度荒年、防盗贼都离不开邻里相助,这就要求把爱家人之心推及乡邻,推己及人、和睦共处。最后,“爱物”是文明追求的至境。人类“生产生命”和“生命生产”必然要将自然世界纳入实践范畴,从而形成“社会-自然”系统——万物。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万物即

“天下”,是天、地、人共时态的生存结构[22]。在传统社会,人们发现只有顺应节气、爱惜地力、取用有节,才能年年有收、长久谋生,对万物的爱惜正由此而生。其中,仁的最高境界是将爱人推扩到爱自然界的万物,最终抵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23]363(《四书章句集注》)对物的爱与对人的爱是不同的,对物的爱是尊重和爱惜。当然,爱有次第先后,必先推己及人,而后方可及物。

综上可见,“亲亲”“仁民”“爱物”存在“理一分殊”的逻辑关系。所谓“理一”,即“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朱子语类》),“仁”贯穿文明发展的始终;所谓“分殊”,即“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23]209-210(《四书章句集注》)由此构建的文明图式有着易难、先后、虚实的区别。

3.“情深而文明”呈现的传统文化景观

中华“情深”文明在传统社会生产出标识性的文化景观。在西方,礼仅存在于“术”的层面,是上流社会彰显尊贵及相互交际的手段,与上层建筑基本没有关系。与此相对,礼在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24],即“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礼”顺着人的本然情感施以节度与文饰,以此调适、疏导人的自然情感,使其发而中节、各得其宜,最终推动社会人伦有序,实现和谐发展。

第一,以“礼”培塑内生的情感秩序。西方通过法构建出的理性秩序是一种外部秩序[25],与此相对,我国传统社会通过“礼”培塑出的情感秩序是一种内部秩序。具体而言,首先,“礼”植根人的羞耻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礼”能激发民众的羞耻心,引导人们自觉恪守“礼”的内在秩序。其次,“礼”合乎人之常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郭店楚简·语丛一》)“礼”能够被世人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契合人之常情。如,对人的情感秩序,“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等;对物的情感秩序,“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等,都是伦常情感的概念化表达。再次,“礼”随时空动态转变。“礼”中“亲亲、尊尊”这种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26]29,但具体遵守的内容可随时空动态转变。“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时间上,随着岁月变迁,“在下者”的角色会有限变动为“在上者”,如子女成为父母、儿媳成为婆婆;空间上,不同地区的乡规民约、宗规家训等会在“礼”的总体要求上微调完善,以契合本土惯习。最后,“礼”融入日常生活。“礼”的精义在于,其把抽象的“礼”“物化”为不等量或不同质的可观外部形式[27],渗透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民众在耳濡目染下便会潜移默化地接纳“礼”背后的秩序设定。“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当尊卑、贵贱、贫富各异的社会成员皆恪守情感本分,各正其名、各安其分、各得其位,社会便会有序运转。

第二,以“礼”培育和谐的情感关系。在人与人相处方面,西方理性文明习惯借助法律化解矛盾,推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权责对等、互不相欠的契约关系。与之相对,中国传统社会把“礼”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依托“礼”维系人际关系。在矛盾情境中,“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矛盾双方需顾全对方情面,各退一步,“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28]。若矛盾升级,家族长者、乡绅会以“礼”唤起双方知耻之心,以达到“息讼”“不争”的调解效果。“礼至则不争”(《礼记·乐记》),“礼”是关系和谐的“稳定剂”。在日常情境中,人们要通过“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来建立和巩固关系。费孝通言,“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26]76。这份算不清的“情债”,维系着成员间的黏着与交好。“礼尚往来,以劝进之”(《史记·卷二十四》),“礼”是关系和谐的“润滑剂”。在人与自然相处方面,不同于西方将自然视为攫取的对象,我国传统社会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既有本体层面要求人们把自身与天地视为共生一

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礼记·郊特牲》);也有认识层面要求人们对自然敬畏,“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礼记·乐记》);还有实践层面要求人们在顺应自然修复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索取,“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礼记·王制》)。

第三,以“礼”培育克己的情感修养。西方一般通过法律制度、道德律令、宗教戒律等方式约束人的私欲。与此相对,我国通过“礼”教化人,使其在无外在强制督导、内心无宗教羁绊的状态下,自觉克制情感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化解私欲与恶情,形成“仁爱”的道德情感,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不可不省也”(《礼记·礼器》)。自省是达成克己,实现从“要我守礼”到“我要守礼”转变的主要途径:一方面要反躬自省己身失礼之行,纵遇旁人无礼,仍守礼自持、向内修心,即所谓“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要向忠臣、孝子等守礼榜样看齐,主动寻找差距,弥补不足,即所谓“见贤思齐焉”(《论语·里仁》)。

三、“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情深”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中华“情深”文明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5]227“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情深”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脉络,进一步增进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与实践自觉。

1. 从大同理想昭示的“天下为公”到发展生产力指向的“共产主义”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包含“天下为公”的社会追求。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是凡夫“私情”向兼济天下“公情”发展的过程[29],其中包含对“天下为公”那种“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礼记·礼运》)等理想社会状态的追求。然而,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与“情深”发展存在内在张力。劳动者即便勤勉耕作、精打细算,也往往仅能完纳赋税、维持基本生存,践行“亲亲”已属不易,而能普遍做到“仁民”与“爱物”的只有少数圣人。可以说,缺乏现实物质基础的支撑,内含于“情深”文明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终究只能是一场美好想象。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中包含的“天下为公”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彼此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6]289。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革命和奋斗的目标,马克思认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53同时,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动力不是唯心史观者强调的“爱”等精神动力,而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1]538 没有生产力的基础,共产主义只能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想象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32]。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天下为公”的社会追求在价值上内在契合,二者均以超越“私有”为旨归,追求美美与共的美好生活。区别于停留在美好想象的“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路径,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6]18。如今,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

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民生保障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国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共同富裕,为“情深”文明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2. 从礼治秩序维系的“以和为贵”到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的“两个和解”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包含“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不论是齐家以求的“家和万事兴”,还是治国以盼的“政通人和”,抑或平天下以臻的“天地人和”,“以和为贵”是“亲亲”“仁民”“爱物”各个层级的共性价值追求。然而,在传统社会,“和为贵”是通过具有等级属性的礼治来维系的,即“礼之用,和为贵”。礼治强调万物差等,诚如《礼记·乐记》所言,“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通过别异立序,让处于等级社会结构中的“在下者”接受自己卑贱的身份,即“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因此,当矛盾冲突发生时,“在下者”需克制、隐忍,甚至自我牺牲,以维系整体和谐。由此可见,“以和为贵”并非意味着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而是通过礼治规训,让“在下者”接受自身卑贱的身份,向“在上者”妥协让步所形成的表层和谐。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中包含的“以和为贵”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两个和解”彼此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33]379,有“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33]379。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两个和解”,即寻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1]185。这种“和解”既非在抽象理念层面的调和,亦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妥协,而是通过扬弃私有制的内在桎梏,在公有制主导的社会形态中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进而从根源上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34]。如今,我国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暴力犯罪案件长期处于全球最低行列,与此同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由此可见,“以和为贵”传统文化升华为由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实现的“两个和解”。

3. 从古典政治倡导的“民为邦本”到民心政治遵循的“人民至上”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包含“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政者要正己正人,带头做表率,这样民众才会效仿其行,遵循其绘制的“亲亲”“仁民”“爱物”文明蓝图,否则便会出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的乱象。然而,在我国古典政治中,民众多为专制王权治理的客体与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主权在君、民众无独立政治主体地位,“民为邦本”是以“本固邦宁”为终极目标。如百善之首的“孝”,其作为一种需要遵守的道德情感,被附加了指向稳固统治的内容[35]。《孝经·士章》有言,“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百姓以孝亲之心侍奉君上,却未必能得到君主对等的体恤与回馈。因此,费孝通曾说,“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26]81。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中包含的“民为邦本”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遵循的“人民至上”原则彼此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6]14 等内容。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尊重、依靠、为了人民群众。马克思强调,与之前革命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0]42 这一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本质。不同于“民为邦本”“人民至上”有着扎扎实实的民心政治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36]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统筹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协同发展,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安排,保障人民依法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公共事务,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让人民主体地位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从而确保“人民至上”真正落地生根。由此可见,“民为邦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从古典政治的道德倡导,升华为民心政治所遵循的“人民至上”准则。

4.从先民自发感悟的“天人合一”到民众自觉认同的“生命共同体”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包含“天人合一”的理念。“亲亲”是天人贯通的内在根基,其以血缘亲情的本真之爱,唤醒人先天禀赋的仁性,确立了仁体由内而外推扩的起点。“仁民”是仁心的人间展开,将“亲亲”的本然之爱推扩至全社会,完成天道之仁在人间世的全面展开。“爱物”是仁心推扩的终极向度,将仁性贯通至天地间一切存在,消解人与天地的主客对立,体认万物同具的生生本性,最终以“万物一体之仁”契入天道生生之德,实现人与天地自然内在、本真的合一。然而,“天人合一”思想缺乏对自然进行对象化、分解式的实证研究,多停留在因对“天”的敬畏形成的自发合一层面,欠缺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科学认知,未厘清主客分野与人类实践能动性的边界,多依托道德自觉与心性修养来顺应天地,弱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人们处于一种适应自然的被动状态。

中华传统“情深”文明中包含的“天人合一”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生命共同体”思想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6]14马克思主义立足唯物史观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路径。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1]161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人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7],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6]18。生命共同体思想突破了传统“天人合一”侧重直觉体悟、被动顺应自然的认知局限,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制度刚性与法治保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永续发展。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从朴素理念跃升为“生命共同体”这一思想。

四、结　语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兼具历史连续性与内在统一性的中华文明[38]不应被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剪裁框定,而是要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土壤,深入探寻并系统阐释其内生演化的独特逻辑与核心特质。有别于“以理驭情”的西方理性文明,中华文明深蕴“情深而文明”的情感底色,这一底蕴既内含由“亲亲”的血缘亲情推及“仁民”的社会关怀、终而升华至“爱物”的生态情怀这一完整的理论演进脉络,又呈现出以礼“治人之情”的传统文化实践图景。从唯物史观视角看,这一深具人文温度的文明特质,恰可为破解人工智能资本化应用带来的技术异化、校准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向提供深层价值支撑[39]。推动中华“情深”文明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更是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鲜明的文化标识的重要依托。经由“第二个结合”,中华文明的情感底蕴焕发蓬勃生机,在时代转型中创造出延续自身情感文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 柴文华,迟浩然. 哲学视域和中国背景:“文化”“文明”及其关系辨析[J]. 理论探讨,2025(3):130-136.

[2] [清]李渔. 闲情偶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2.

[3] 高力克. 思想的复调:重思中国现代思潮中的“文明”与“文化”[J]. 探索与争鸣,2021(9):100-111.

[4] 刘也. 从文明的概念到文明的再生产——一种反思西方现代化文明的进路[J]. 哲学动态,2025(3):30-41.

[5] 习近平.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7] 蒙培元. 情感与理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罗朝明,王晓涵. 激情、节制与好生活: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J]. 江海学刊,2018(4):101-111.

[9]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5[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0.

[10]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4.

[11] 陈迎年等. 中国精神十二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44.

[12] [德]黑格尔. 黑格尔历史哲学[M]. 潘高峰,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3.

[13] [英]大卫·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9.

[14] [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 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89:97.

[15] 郭景萍. 中国情感文明变迁 60 年——社会转型的视角[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8.

[16] 刘远杰,熊庆澄. 情深而文明:现代教育文明的中国基因与变革取向[J]. 教育发展研究,2024(23):10-19.

[17] 李泽厚.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上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52.

[18] 何雪松. 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 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19] [美]吕坤维. 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心理学阐释[M]. 谢中垚,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9-30.

[20] 杨海文. “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以《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为中心[J]. 江海学刊,2024(4):63-69.

[21]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04.

[22] 董平.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J]. 哲学研究,2006(6):41-46.

[23]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邹昌林. 中国礼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25] [英]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 邓正来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56.

[2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7] 徐进. 礼治的精义及其影响[J]. 文史哲,1997(1):24-28.

[28]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8.

[29] 郭景萍. 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33.

[3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

[3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91-92.

[35] 王刚,李爽. 先秦儒家“孝”思想内涵及其当代观照[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8-38.

[3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60.

[3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38] 赵月,邹广文. 论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兼论中华文明标识性话语的生产[J]. 道德与文明,2025(2):19-28.

[39] 姚修杰.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2):130-138.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motional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 Zhu Kaiwe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the semantics of the Chinese term “civilization” encountered challenges from the narrative logic and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Western rationalist civilization. Unlike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governs emotion with reason and is premised on the dualism of reason and emo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profound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deep emotion and luminous civilization”, and has forged a civilizational path that starts from emotion and unifies emotion with reason. Emotion is the ontological source from which civilization arises. Natural emotion, throug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emotion—the cultivation fostered by “ritual propriety”—is elevated into moral sentiment. Through the expansive unfolding of “one principle with many manifestations”, it develops from affection for kin, namely, “loving one's parents”, to benevolence toward the people, expressed as “broadly loving all people”, and ultimately attains “love for all things”, in which all things form one body; it is in this way that civilization continuously develops. The inner logic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deep emotion” found outward express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s a cultural landscape in which ritual propriety cultivated an endogenous emotional order, nurtured harmonious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fostered the emotional cultivation of self-restraint. Throug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finest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motional culture—“all under Heaven belongs to the public” proclaimed by the ideal of the Great Unity, “harmony as the most valuable” sustained by the ritual order,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dvocated by classic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spontaneously apprehended by the ancients—have been reactivat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y have been elevated into new cultural life-forms: “communism” oriented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advanced by the socialist system,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upheld by the people-centered politics,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 consciously embraced by the people. These developments thereby promote the vital renewal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deep emotion”,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 carries forward the emotional cultural lineag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resolving the conflicts, opposition, estrangement, and alienation among the world's civilizations, and to transcending the theory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hierarchy.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reason; emotion